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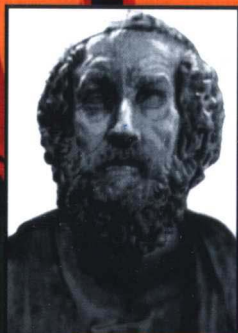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

柳鸣九 主编

荷马精选集

陈中梅◎编选



Series Sele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外国文学名家
精选书系

荷马精选集

陈中梅 ● 编选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马精选集/(古希腊)荷马著;陈中梅编选.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4

ISBN 7-5402-1684-0

I. 荷… II. ①荷… ②陈… III. 史诗-古希腊 IV. I54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6659 号

责任编辑:杨韶蓉 张红梅 李江华

荷马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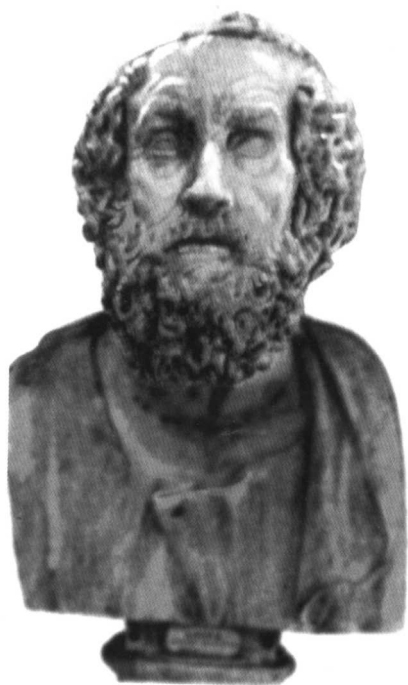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35 印张 940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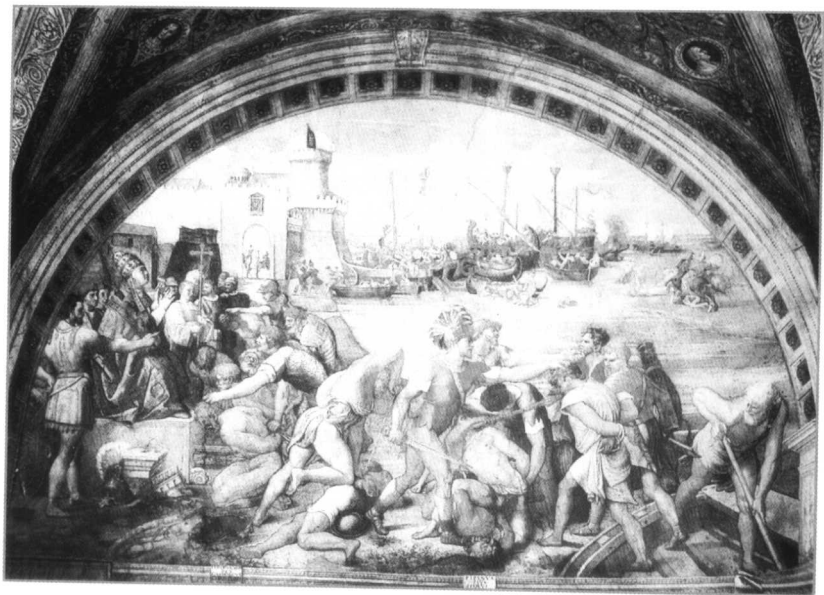
荷马像



荷马的神格化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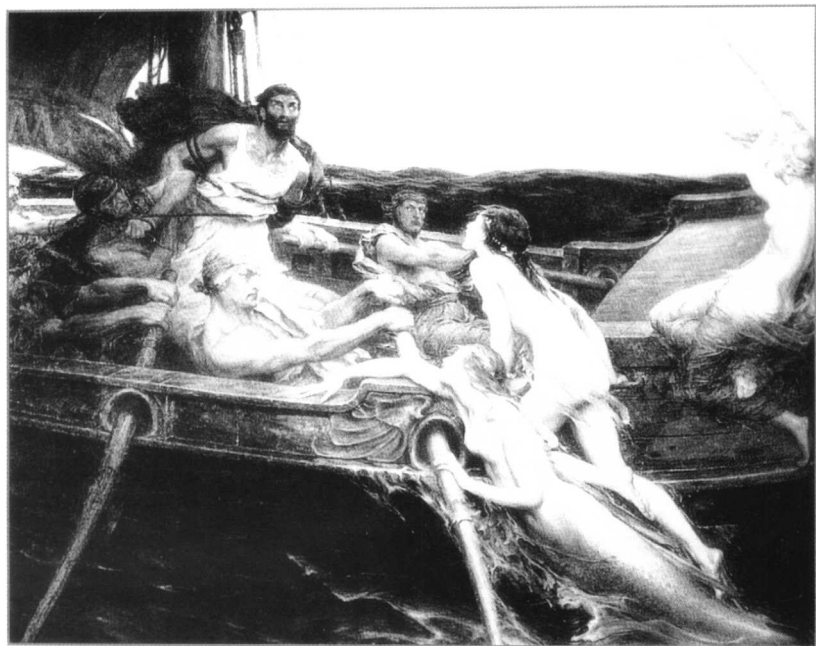
荷马的吟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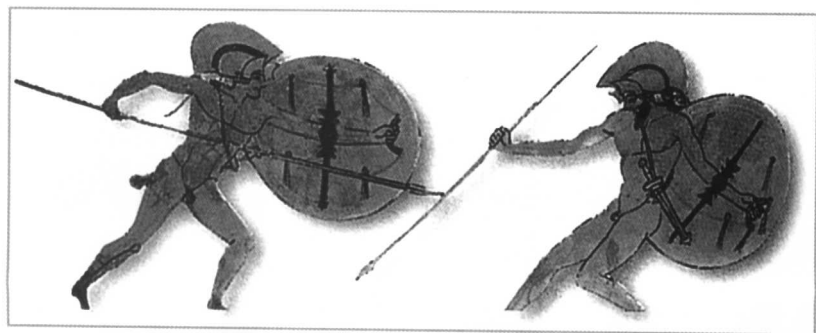
特洛伊之战



希腊步兵



俄底修斯与塞壬



阿基琉斯与赫克托耳交战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兹编辑出版“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种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目标,分批出版,每批十种。

本书系在已经出版了四十种的基础上,计划总共达到八十至一百种,以期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文经典文库。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兹表示深切的谢意。

柳鸣九

二〇〇三年一月

编选者序

陈中梅

荷马的身世向来扑朔迷离。有西方学者甚至怀疑历史上是否确有荷马其人。英国诗人兼文论家马修·阿诺德曾用不多的词汇概括过荷马的文风,其中之一便是“简明”(simplicity)。然而,这位文风庄重、快捷和简朴的希腊史诗诗人却有着不简明的身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其“庐山真面目”的疑团。首先是他的名字。Homeros 不是个普通的希腊人名。至少在希腊化时期以前,史料中没有出现过第二个以此为名的人物。Homeros 被认为是 homera (中性复数形式)的同根词,可作“人质”解。HomerosF 亦可拆解作 ho me (h) oron,意为“看不见(事物)的人”,亦即“盲人”。这一解析同样显得勉强,也许是根据《奥德赛》里的盲诗人德摩道科斯所作的类推,把荷马想当然地同比为古代歌手中不乏其人的瞽者。细读史诗,我们会发现荷马有着极为敏锐的观察力,对色彩的分辨尤为细腻。荷马的名字还被解作短诗的合成者。有学者试图从 Homeridai (荷马的儿子们,荷马的后代们)倒推 homeros 的成因,所作的努力值得嘉许。然而,此类研究也可能走得过远。比如,历史上曾有某位英国学者,此君突发奇想,竟将 Homeros 倒读为 Soremo,而后者是 Soromon 的另一种叫法,由此将荷马史诗归属到了一位希伯莱国王的名下。应该指出的是,从字面推导含义是西方学者惯用的符合语文学(philology)常规的做法,即便尝试倒读人名,也算不得十分荒唐,只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与事实不符乃至南辕北辙,这是我们应该予以注意的。

即便承认荷马确有其人,他的生活年代也充满变数,让人难以准确定位。学者们所能做的,只是提出并满足于自以为能够自圆其说的设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延伸评估)。从特洛伊战争时期

(一般认为,战争的开打时段在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之间)到战争结束以后不久,从伊俄尼亚人的大迁徙到公元前九世纪中叶或特洛伊战争之后五百年(一说一六八年),都被古人设想为荷马生活和从艺的年代。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荷马的在世时间“距今不超过四百年”,换言之,大约在公元前八五〇年左右(《历史》2.53);而他的同行修昔底德则倾向于前推荷马的创作时间,将其定位于特洛伊战争之后,“其间不会有太远的年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3)。荷马到底是哪个“朝代”的人氏?我们所能找到的“外部”文献资料似乎不能确切回答这个问题。另一个办法是从荷马史诗,即从“内部”寻找解题的答案。大量文本事实表明,荷马不生活在迈锡尼时期,因此不可能是战争的同时代人。从史诗中众多失真以及充斥着臆想和猜测的表述来看,荷马也不像是一位生活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久的“追述者”。由此可见,希罗多德的意见或许可资参考。但是,考古发现和对文本的细读表明,希罗多德的推测或许也有追求“古旧”之虞。《伊利亚特》6.302—303所描述的塑像坐姿似乎暗示相关诗行的创编年代不太可能早于公元前八世纪;11.19以下关于阿伽门农盾牌的细述,似乎表明这是一种公元前七世纪以后的兵器;而13.131以下的讲述更给人“后期”的感觉,因为以大规模齐整编队持枪阵战的打法有可能盛行于公元前七世纪末以后。著名学者沃尔特·布爾克特(Walter Burkert)将《伊利亚特》的成诗年代推迟到公元前六六〇年的做法^①,似乎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赞同。荷马史诗自有他的得之于历史和文学传统的古朴性,零星出现的后世资证和著名学者的“靠后”评论,都不能轻易改变这一点。综观“全局”,我们认为,把荷马史诗的成篇年代定设在公元前八世纪中叶或稍后比较适宜,其中《奥德赛》的成诗或许稍迟一些,可能在公元前八世纪末或前七世纪初。事实上,这也是许多当代学者所持的共识。大

^① Martin Mueller, *The Iliad*,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4, p. 1. 不排除史诗中的极少量内容可能得之于公元前六六〇年以后增补的可能。

致确定了荷马史诗的成诗时期,也就等于大致确定了荷马的生活和活动年代。如果古希腊确实出现过一位名叫荷马的史诗奇才,那么他的在世时间当在公元前八世纪——这一时段定位或许比别的推测更接近于合理,更少一些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可信史料的匮乏(以及误读史料)所造成的很难完全避免的草率。

荷马的出生地在哪儿?这个问题同样不好准确回答。《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均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公元前八世纪至前七世纪也没有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作为信史引证的第一手资料。据说为了确知荷马的出生地和父母是谁,罗马皇帝哈德里安还专门求咨过德尔菲的神谕^①。在古代,至少有七个城镇竞相宣称为荷马的出生地,并且似乎都有各自的理由。它们是斯慕耳纳(现名伊兹米尔)、罗德斯、科罗丰、(塞浦路斯的)萨拉弥斯、基俄斯、阿耳戈斯和雅典。能够成为荷马的乡亲,自然是个莫大的荣誉,尤其是在公元前六世纪以后,诗人的名望鼎盛,如日中天。但是,荷马的出生地毕竟不可能多达七处,否则我们将很难把他当做一介凡人(只有神才可能有那样的“分身术”)。希腊文化的传统倾向于把荷马的故乡划定在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的伊俄尼亚希腊人的移民区。任何传统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荷马对伯罗奔尼撒的多里斯人所知甚少,表明他不是从小在那个地域土生土长的。此外,《伊利亚特》中的某些行段(比如 9.4—5, 11.305—308)暗示他的构诗位置可能“面向”希腊大陆(或本土),即以小亚细亚沿海为“基点”。荷马所用的明显带有埃俄利亚方言色彩的伊俄尼亚希腊语,也从一个侧面佐证着他的出生地不在希腊本土或罗德斯等地。再者,作为一个生长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荷马或许会比生活在希腊本土的同胞们更多一些“国际主义”精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叙事的中性程度以及不时流露出来的对敌人(即特洛伊人)的同情心里看出来。上述原因会有助于人们把搜寻的目光聚集到

^① 参考 Daniel B. Levine, "Homer's Death in the Biographical Tradition", *The Classical Journal* 98. 2(2002/03), p. 141.

小亚细亚沿海的斯慕耳纳和基俄斯,与传统的认识相吻合。我们知道,阿耳戈斯曾是个强盛的城邦,而公元前六世纪以后,雅典逐渐成为希腊的文化中心和书籍发散地(阿里斯塔耳科斯就认为荷马是雅典人),但历史和文本研究都不特别看好这两个地方,所以即使在古代,它们的竞争力也不甚强劲,无法与基俄斯等地相抗衡。基俄斯的塞蒙尼德斯设想基俄斯是荷马的出生地(片断 29; 他称荷马是一个“基俄斯人”(Chios aner));事实上,那儿也被古代文论家认为是“荷马的后代们”(Homeridai)发迹并长期诵诗从业的地方。在古代,荷马被认为是史诗作者(或诗人)的代名词,所有的“系列史诗”(如《库普里亚》、《埃塞俄丕亚》和《小伊利亚特》等)以及众多的颂神诗(如《阿波罗颂》和《赫耳墨斯颂》等)都被认为出自荷马的凭借神助的天分。基俄斯诗人库奈索斯创作了《阿波罗颂》,但却并不热衷于拥享作品的署名权。不仅如此,他似乎还有意充分利用人们对荷马的感情,凭借人们对荷马的印象,宣称该诗的作者是一位“来自山石嶙峋的基俄斯的盲(诗)人”(tuphlos aner,《阿波罗颂》172)。库奈索斯的做法当然可以理解,因为他不仅是基俄斯人,而且还是当地“荷马后代们”的首领,率先(公元前五〇四年)向远方输出荷马的作品,在苏拉库赛(即叙拉古)吟诵“老祖宗”的史诗。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相信荷马的家乡在基俄斯,但史学家欧伽蒙和学者斯忒新勃罗托斯则沿用了公元前五世纪同样流行的荷马为斯慕耳纳人的传闻。抒情诗人品达的“视野”似乎更显开阔,既认为荷马是斯慕耳纳人(片断 279),也愿意“折中”,即接受荷马同时拥有基俄斯和斯慕耳纳双重“国籍”的提法。有人认为荷马出生在斯慕耳纳,但在基俄斯完成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创作。相传荷马卒于小岛伊俄斯,该地每年一次,在一个以荷马名字命名的月份,即 Homereon 里用一只山羊祭奠诗人的亡灵。

荷马的名字绝少见于公元前七世纪的作品史料。学问家鲍桑尼亚斯(生活在公元二世纪)在谈到史诗《塞贝德》后写道:“卡莱诺斯曾提及这部史诗,并认为此乃荷马所作。”(ephesen Homeron

ton poiesanta einai,《描述希腊》9.9.5)一般认为,卡莱诺斯即为厄菲索斯诗人卡利诺斯,其活动年代在公元前七世纪上半叶,以擅作对句格诗歌著称。如果卡莱诺斯即为卡利诺斯的推测不错,那么鲍桑尼阿斯的引文或提及很可能是现存惟一的一则比较可信的可资论证一位公元前七世纪诗人提及(原作当然早已佚失)荷马名字的珍贵史料。需要指出的是,卡利诺斯不太可能称荷马创编了《塞拜德》,因为这部史诗的成文年代很可能在公元前六世纪。卡利诺斯的意思或许是,他知晓发生在塞贝的战事,而荷马作为一位史诗诗人,编述过关于那场战争的故事^①。一位生活年代不迟于公元三世纪的拜占庭评论家曾提及阿耳基洛科斯的观点(片断304W.),称这位诗人相信《马耳吉忒斯》乃荷马的作品。阿耳基洛科斯同样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但考证表明《马耳吉忒斯》的创作年代当在公元前六世纪初以后,所以拜占庭评论家的论述显然有误,与事实不符。阿耳基洛科斯或许知晓荷马,但他的诗作已基本佚失,使我们无法就此进行准确的辨析。有趣的是,“傻瓜史诗”《马耳吉忒斯》长期被古代文家们认定为荷马的作品。我们知道,迟至公元前四世纪,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文论家依然对此深信不疑,将《马耳吉忒斯》看作是喜剧的“前身”(参阅《诗学》4.1448b38—1449a2,另参考《尼各马可伦理学》6.7.1141a14)。同样伪托公元前七世纪诗人提及荷马的还有另一见例。著述家菲洛科洛斯(出生在公元前三四〇年以前)引用过据说是出自赫西俄德的三行诗句(片断<dub>357 M.—W.),其中包括“我与荷马在德洛斯高歌”,“颂唱莱托之子、持金剑的福伊波斯·阿波罗”等词语。菲洛科洛斯肯定是凭借道听途说编叙的,他的离奇说法在古代就没有什么信奉者,当代学者更不会把它当作严肃的史料加以引用。赫西俄德确曾参加过诗歌比赛并且获奖,但地点是在卡尔基斯,不是在德洛斯,而他的对手应该也不是荷马,否则很难相信

^① 参考 M. L. West, “The Invention of Homer”, *Classical Quarterly* 49.2 (1999), p. 377.

他会在对那次歌赛的记述中放过这一宣扬自己的绝佳素材,不予提及(参阅《工作与时日》654—659)。尽管如此,在公元前七世纪,荷马不是默默无闻的。据说诗人忒耳庞德耳曾在斯巴达吟诵荷马的诗作,图耳泰俄斯、阿尔克曼和阿耳基洛科斯等诗人都引诵过《伊利亚特》或《奥德赛》里的诗行。也就在同一时期,《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里的某些内容已见诸瓶画。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诗人的引诗有可能出自公元前八世纪以前即已成诗流行的短诗,而这些诗段也是荷马用以加工并构组长篇史诗的原材料。同样,瓶画艺术家们也可能取材于荷马史诗以外内容近似的故事,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后,使其成为可视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景观形象。

荷马的得之于传统的历史真实性在公元前七世纪没有受到怀疑。尽管如此,荷马的名字在那个时期成文的作品中非常罕见,这或许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人们的疑虑,也可能与存世作品的稀少不无关系。公元前六世纪初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质的改变,荷马名字的出现率大幅度提升,仿佛人们突然意识到荷马的重要,觉得既然可以随意复诵或引诵他的诗行,就不必忌讳提及他的名字,不必再对荷马的历史真实性存有戒心。或许,“荷马后代们”的活动逐渐开始发挥作用,不断扩大着荷马的影响,最终汇同其他因素,使荷马的名字进入千家万户,成功塑造了一位“诗祖”的形象。在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荷马是否确有其人已经不是问题。人们热衷于关注的是荷马的功绩(以及功绩有多大),此外便是他的过错。人们开始评论荷马。有趣的是,得以传世至今的对荷马及其诗歌最早的评论,不是热切的赞颂,而是无情的批评。科洛丰诗人哲学家塞诺法奈斯抨击荷马和赫西俄德的神学观,指责他们所塑造的神明是不真实、有害和不道德的(片断11、14、15)。大约三四十年之后,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以更严厉的措词狠批荷马,认为荷马应该接受鞭打,被逐出赛诗的场所(agones,片断42)。据传毕达哥拉斯曾在地府里目睹过荷马遭受酷刑的情景。故事的编制者显然意在告诉世人:荷马为自己对神祇的不体面描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此类传闻荒诞不经,自然不可信靠,这里略作提及,或许可从

一个侧面说明后世某些哲人对荷马以及由他所代表的诗歌文化的憎恨程度。公元前六世纪,新兴的逻各斯(logos)思想开始在希腊学界精英们集聚的城邦里传播,哲人们显然已不满于荷马史诗对世界和神人关系的解释,迫切想用能够更多反映理性精神的新观点取代荷马的在他们看来趋于陈旧的“秘索思”(mythos,“诗歌”、“故事”)。在新旧思想碰撞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哲学对诗歌的批评,自然会把攻击的矛头对准荷马,这一点不足为怪。当然,哲人们本来或许可以把语气放得温和一点,这样既可以显示风度,又能给从来无意攻击哲学的诗歌保留一点面子,还能为自己日后向诗歌的回归(至少是靠拢,如或许指望用自己的诗性哲学取代荷马的传统诗教的柏拉图所做的那样)提前准备一条退路。

真正有意将荷马扫地出门的哲学家只是极少数。荷马对希腊哲人的潜在和“现实”影响是巨大的。我们不敢断定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在提出水乃万物之源观点之前是否受过荷马关于大洋河俄开阿诺斯是众神之源的见解(《伊利亚特》14.246)的启示,但后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某些成员热衷于引用荷马的诗行以论证自己观点的做法,却是古典学界广为人知的事实。苏格拉底的老师阿那克萨戈拉斯对荷马史诗的喻指功能兴趣颇浓,而他的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对荷马的敬重和赞扬更是有目共睹。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曾赋诗赞美过老师柏拉图,但比之他在《诗学》里热情讴歌荷马及其史诗的话语,他对柏拉图的赞扬不仅显得零碎,而且肯定不够具体。就连有意把荷马史诗逐出理想国的柏拉图本人,也对荷马怀有深深的景仰之情,并且会在行文中情不自禁地信手摘引他的诗句,以佐证自己的观点。柏拉图对荷马史诗的喜爱一点也不亚于奥古斯丁对维吉尔的作品,只是二者都出于维护各自政治和宗教理念的需要,不得不努力遏制自己的“情感”,服从“理性”的支配,转而攻击或批判自己原本喜爱的诗人。

就在少数哲人批贬荷马的同时,诗人们却继续着传统的做法,就整体而言保持并增加着对荷马的信赖和崇拜。西蒙尼德斯赞慕荷马的成就,认为由于荷马的精彩描述方便古代达奈英雄们的业

绩得到了彪炳后世的传扬。在说到英雄墨勒阿格罗斯在一次投枪比赛中获胜的事例时,他提到了荷马的名字,用以增强叙事的权威性:“荷马和斯忒西科罗斯便是这样对人唱诵的。”(参阅《对句格诗》11. 15—18, 19. 1—2, 20. 13—15)埃斯库罗斯谦称自己的悲剧为“荷马盛宴中的小菜”(阿塞那伊俄斯《学问之餐》8. 347E)。我们了解埃斯库罗斯对悲剧艺术的卓越贡献,认可他的作品所取得的高度的艺术成就。他之所以这么说,固然是考虑到荷马史诗的规模和数量(在当时,荷马被普遍认为不仅仅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但同时可能也是出于他对荷马的敬重和叹服。他不认为自己的成就可以与荷马相提并论,故用了“小菜”(或“小吃”)一词。当然,从埃斯库罗斯的形象比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纳入荷马的“系统”(柏拉图称荷马为第一位悲剧诗人),以能够成为荷马传统的一部分而感到光荣。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感情还是气质或(行文)“品格”来评判,埃斯库罗斯都秉承了荷马的遗风,是最具荷马风范的悲剧诗人。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同样崇拜荷马。他赞赏荷马的博学,不怀疑他在希腊民族中所处的当之无愧的教师地位,誉之为“神圣的荷马”(theios Homeros,《蛙》1034)。抒情诗人品达摘引荷马,赞同当时流行的荷马是史诗《库普里亚》作者的观点(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希罗多德是把《库普里亚》删出荷马作品的第一人,《历史》2. 117),并称荷马把这部史诗作为陪嫁,将女儿嫁给了库普里亚(即塞浦路斯)人斯塔西诺斯。品达对荷马并非没有微词,但是,他的批评是含蓄而合乎情理的,有别于同样多次提及荷马的赫拉克利特对他的恶毒攻击(当然,在崇尚言论自由的古希腊,这么做是允许的)。品达认为,荷马拔高了古代英雄们的形象,以他典雅和瑰美的诗句使奥德修斯受到了过多的赞扬(《奈弥亚颂》7. 20—21)①。

① 品达三次提到荷马的名字。品达的提及客观上起到互相“增光”的作用,使两位大诗人(即荷马和他本人)相得益彰(参考 *A New Companion to Homer*, edited by Ian Morris and Harry Powell,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1997, p. 39.)

希罗多德引用荷马史诗十一个行次。此外,作为书名,《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最早见诸于他的著述(《历史》5.67)。修昔底德引《伊利亚特》仅一个行次,但引《阿波罗颂》的诗行却高达十三例。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是把《阿波罗颂》当作荷马史诗加以引用的。这表明他也像许多前辈文人一样,将包括《阿波罗颂》在内的我们今天称之为《荷马诗颂》的众多颂神诗都看作是荷马的作品。这种情况在公元前四世纪发生了改变。亚里士多德似乎已不认为《阿波罗颂》是荷马的诗作,尽管他仍然把《马耳吉忒斯》归入荷马的名下。当柏拉图和塞诺芬提及荷马史诗时,他们的指对一般均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引诗行似乎也都出自这两部史诗。从现存的古文献来看,雷吉昂学者塞阿格奈斯(Theagenes,活动年代在公元前五二五年前后)是希腊历史上著述研究荷马史诗的第一人,所著《论荷马》以讨论荷马史诗的喻指“功能”为主,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即已失传。他提出的荷马史诗里的神祇皆可喻指自然界里的物质或现象的观点,对后世学者解读荷马的影响甚深,斯忒新勃罗托斯(据说他能揭示作品中藏而不露的意思<tas huponoias>),格劳孔和阿那克萨戈拉斯等人都曾沿袭他的思路,著述或研讨过当时(即公元前五世纪)的学者们所关注的某些问题。柏拉图对荷马史诗颇有研究,但囿于自己的学观取向,他的研究往往多少带有偏见,无助于人们正确和客观公正地解读荷马。亚里士多德写过《论诗人》、《论修辞》、《论音乐》、《诗论》等著作,其中应该包括研析荷马史诗的内容。《荷马问题》是一部探讨荷马史诗里的“问题”和如何解析这些问题的专著,可惜也像上述文论一样早已失传。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他的论诗专著中硕果仅存的一部(当然,他的《修辞学》也间接谈到诗论问题)。在《诗学》里,亚里士多德高度评价了荷马史诗的艺术成就,赞扬他“不知是得力于技巧还是凭借天赋”,几乎在有关构诗的所有问题上都有自己高人一筹的真知灼见(《诗学》8.1451a22—24)。罗马文论家贺拉斯很可能没有直接读过《诗学》,但有理由相信他会从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塞俄弗拉斯托斯和其他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成员